



他们书写中国二十年来最壮丽的登山史诗

——从《比山更高》看自由攀登者挑战极限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干晶 通讯员 李英

《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悲情与荣耀》(以下简称《比山更高》)是近日出版的一部非虚构作品,作者宋明蔚曾任《户外冒险》执行主编,参与国内外近百起重大户外事件的采访、调查与报道,是中国户外金属牛奖评委,在工作中深入登山圈层的内部与攀登文化的内核。宋明蔚耗时近三年,大量阅读、采访、调查,在《比山更高》一书中全景式呈现了此前不为人知的极少数人群的生命场景与真实故事背后的生命深度,与读者探讨价值选择、人生际遇以及灵魂底色。

同为非虚构作品,《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的作者杨潇评价《比山更高》:“这是一幅记录中国自由攀登者的高分辨率的全景画卷。我们跟着作者在不同时空中漫步穿梭,有幸借他的讲述品咂热血与永恒之味。”

12月7日,宋明蔚来到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借由《比山更高》说开去,分享遥望、瞻仰与攀登的故事,了解人类与高山的关系、欣赏高山的美学价值、审视人类的伟大和渺小。

描述高山从“峰、岭、峦、岳”到“海拔”

宋明蔚的讲述从一幅古画展开——文徵明的《关山积雪图》。1528年,59岁的文徵明和王宠同游上方山,借宿在楞伽寺。窗外漫天飞雪,王宠拿出笔墨纸砚,请文徵明把美景留存于纸上。这一画,足足五年。1532年,文徵明完成了《关山积雪图》的创作,长卷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冬日群山的壮丽之景。画卷的题跋中这样写道:“古之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笔,作山水以自娱。然多写雪景者,盖欲假此以寄其孤高拔俗之意耳。若王摩诘之雪溪图,李成之万山飞雪,李唐之雪山楼阁,阎次平之寒岩积雪,郭忠恕之雪霁江行,赵松雪之袁安卧雪,黄大痴之九峰雪霁,王叔明之剑阁图,皆著名今昔,脍炙人口……”宋明蔚说,由此可以看出,在传统中国人审美里,雪景山水表现的是“孤高拔俗”的人格品性。

宋代画家郭熙主张:“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将山比拟如美人,映射人的心态。

古人寄情山水,他们怎样称呼山呢?宋明蔚介绍,“峰”指高而尖的山;“岭”则是连绵成片的山;“峦”也是连绵的,但顶部较平;“岳”特指高而大的山。受时代所限,古人仰望与攀登的山集中在中国中部、东部,“他们登山的脚步向西止于成都”。

近代建立起“海拔”的概念,山分为低山(海拔500米至1000米,如北京香山)、中山(海拔1000米至3500米,如山东泰山、安徽黄山)、高山(海拔3500米以上,如秦岭主峰太白山)、极高山(海拔5000米以上)。“五岳里最高的华山也只在中山范畴,五岳加起来的海拔高度还不如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宋明蔚说道。

珠穆朗玛峰名称的由来

大众对于极高山最通俗的称呼是“雪山”,所有雪山中最著名的是珠穆朗玛峰,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也是世界第一高峰。宋明蔚讲述了珠穆朗玛峰发现与名称由来。

珠穆朗玛峰的名字来源于藏语,意为“圣母”。1708年,康熙为了绘制《皇舆全览图》,派人随军队进入西藏进行测量。1720年,《皇舆全览图》绘制完成并“铸以铜版藏内府”。铜版图中西藏和满蒙地区名字使用的是满文,共八排四十一幅,可以说是最早的关于珠穆朗玛峰的文献。1721年木版三十二幅的《皇舆全览图》将满文转换成为了汉字。珠峰标注为“朱母朗马阿林”,其中“阿林”为满语中的“山”,这是珠穆朗玛峰最早的汉译名称。

1749年,乾隆派人到西藏地图重新实测,绘制新图。从1760年到1770年绘制的《乾隆内府舆图》,首次使用了“珠穆朗玛阿林”的名称,1822年的《皇朝地理图》和1864年《大清一统舆图》都是根据内府舆图绘制,使用了“珠穆朗玛山”的名称,去掉了“阿林”。

1855年,英属印度测量局时任局长为感恩自己的老师,将珠峰定名为“埃佛勒斯峰”。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长时间也采用了这个英文名称作为标准名,音译为额菲尔士峰。我国地理学家、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林超查阅大量中外文献,周密考证了珠穆朗玛峰发现与命名的经过,在1958年发表了论文《珠穆朗玛的发现与名称》。林超在论文里列举了大量文献,证明藏族同胞在很早就认识和了解珠峰,并且给它起了名字——珠穆朗玛。在1760年乾隆时期的地图上,就开始出现了与我们今天写法完全相同的“珠穆朗玛”,而英属印度测量局在1852年测量珠穆朗玛峰,比我国测绘珠穆朗玛峰晚了至少135年之久。

1952年5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和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联合发布通报,将“额菲尔士峰”正名为“珠穆朗玛峰”,捍卫了我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

今年12月5日,著名登山运动员贡布逝世,享年91岁。1960年5月25日,作为中国登山队队员,他与王富洲、屈银华成功登顶珠峰,创造了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伟大壮举。宋明蔚说:“人类的极限与边界通常是由少数人开拓的。”

人类和高山共创美学

在现代登山运动中,喜马拉雅式登山和阿尔卑斯式登山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宋明蔚介绍,阿尔卑斯式登山的特点在于轻装快速,又称作自由攀登,往往是两到三人组成的小团队,自主攀登一条颇有技术难度的登山路线。每个人在团队中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它更接近登山原始形态,也更加自由。阿尔卑斯式登山更强调登山者的自给自足,他们凭借较为简单的设备,以相当快的速度挑战难度很大的山峰。”

处在公众视野中心的,往往是大型、官方的喜马拉雅式攀登。“喜马拉雅式攀登体现的是另一重组织艺术:行军布阵的艺术,把握好天气窗口的艺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艺术,把一个个螺丝钉与螺母调试完备从而组装出一套强大系统的艺术。”

在《比山更高》一书里,宋明蔚记录的正是前者:自由攀登者。“在国内,这样的群体只有几百人,但正是他们,书写了中国过去二十年来最壮丽的登山史诗。”

宋明蔚向读者介绍自己的写作初衷:自由攀登者只是默默地挑战自身的极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有的人从清华这样的名校肄业,有的人失去高薪工作,居无定所,还有的人与家人矛盾重重。选择走向大山,融入大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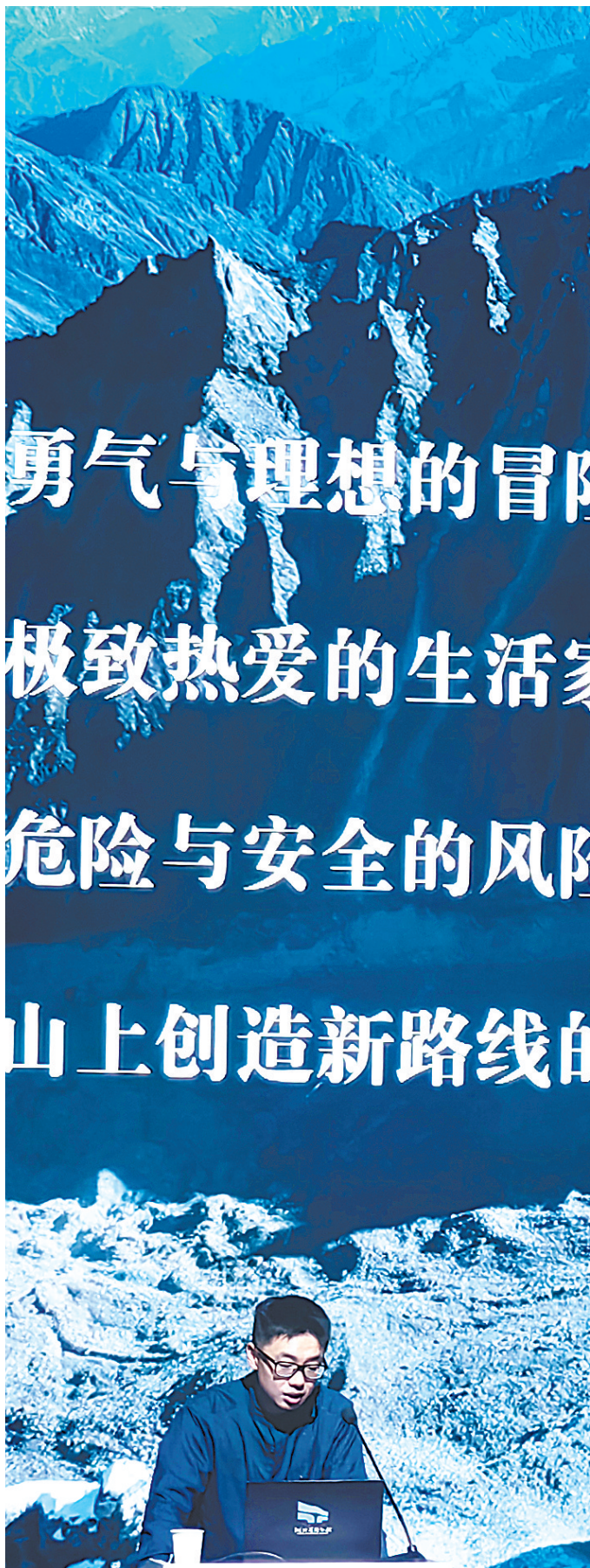
新婚的论坛版主王苗、攀岩能手刘喜勇、技术一流的李红学、亲和迷人的陈家慧……《比山更高》一书最早击中读者的可能是悲情。太多的名字,太多的故事,都留在了大山里。宋明蔚说,我写进书里的自由攀登者们,有的已经永远离开了,有的还活跃着。离去的几十个人的平均年龄是31岁,我写这本书时也是31岁。因为这个原因,我写作时有一种特别的使命感,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我一厢情愿。站在31岁这个节点,我想到很多。按照古人的说法“三十而立”,可能一个人刚刚有了独立的思想,刚刚

找到自己一个为之奋斗的事业,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但却在一个瞬间,一切的可能性都消失了。但在另一个层面,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并愿意为之付出一切。

任何曾经为某种超功利的目标燃烧过自己的人,都会发觉这本书的迷人。书里写道:“如果把攀登比作一门艺术的话,那么攀登者就是艺术家。如同文人写字,画家绘画,诗人吟诗,攀登者的艺术作品就是在山峰或岩壁上开辟的新路线。他们运用纯熟的技术和丰富的想象力,在山体上演绎着充满美感的路线,并在‘创作’的过程中展现出惊人的勇气与意志力。他们开辟了一条自己命名的新路线,从此便在浩瀚宇宙中有了属于自己坐标。”

登山者的故事不仅仅关于攀登,更关于人类超越自我的激情。攀登者把强大的个体生命力、想象力和最极致的意志力投射到山体的纹理之上,从而开辟出独具个人审美体验的新路线。宋明蔚说:“这一刻起,人类和高山共同创造出了美学,既是天地间的自然美学,也代表人类最极致的生命美学。”

曾经我们对高山充满了敬畏,乃至恐惧。高山有时是可怖的,有时又是神圣的。宋明蔚与读者分享,过去一百年来,我们开始走进高山,带着祛魅的精神与无畏的勇气打量群山。渐渐地,我们对高山的感情也发生了变化:挑战而非畏惧,俯瞰而非仰望,迷恋而非躲避。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现代人又开始将自身与自然隔绝开来。如今,群山正召唤我们回来。但高山依旧是狂野的,不为人类所控。高山并不寻求人类的热爱,也不寻求我们的死亡。高山一无所求。这既是高山的危险之处,也是高山的魅力所在。然而,高山改变了我们看待自身的方式:磨砺我们的精神,审视自己的傲慢,激发人类的创造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重拾高山的野性,学会欣赏山岳之美。



宋明蔚在长江讲坛与读者分享。

《比山更高》封面。

《荒野上的大师》于深谷中劈出光明

□ 芷舫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的纪念,人们或许对现代考古学的起源——仰韶文化的发现印象深刻,但仰韶文化的发现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公众对此却几乎陌生。一代学人们的奔走努力最终化作寥寥数字。

但他们不能被遗忘,这些初辟鸿蒙披荆斩棘一路向前的学人们,不仅在学术上为今人开出一条路,更是在精神上闪耀着光辉,照亮后人前进的方向。他们值得一书再书。

一部大师的索引

《荒野上的大师》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撷取了四座高峰:地质研究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营造学社。书中用四个章节分别钩沉了围绕这四个机构的民国学人往事。

作为知名纪录片撰稿人,本书作者张泉将其的传播技巧和知识积累化为一气,充盈在了选题视角、材料摘取和谋篇布局各环节中。从选题上来看,取舍尤为不易。在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可敬可佩的人太多,可歌可写的故事也太多,每一位大师的生平和学术都是一个单独的研究命题,如何从中撷取光华连成珠串则十分考验讲述者的功力。本书最终选择将视角聚焦在这四个机构上,不仅在于它们的典型性和重要性,更在于这些机构囊括了当时最顶尖的学者。他们与时代相互成就,也随着时代起伏动荡,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作者对材料的采用十分克制,用极简的笔墨极尽声色地讲述学人身上最慑人的精神气魄,和那些本应被铭记却埋于历史烟尘的往事。对各个部分各个人物的讲述用笔平均,没有厚此薄彼,故事总是收于刚刚好,而情绪总是推到最饱满。

由此,读者阅读一本仅25万字的书籍,却仿佛目睹了许多人的一生。他们青年时游学世界各地,学成归国后踌躇满志,凭借矢志报国的一腔热血投身于田野,走上一条前无古人的险路。他们所处的时代,尽管内忧外患,治学条件极端艰苦,但对于学人,却是一个有广阔空间任由驰骋的自由年代,是最好的年代。

他们开疆拓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构筑根基,为后来人铺平道路。战争的洪流也没有饶过他们,昔日并肩作战的挚友们流于各地散落天涯,四座学术高峰也渐渐坍塌,经历了黄金时代的学人们最终不得不陷于“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州”的时代悲音中。

由于出场人物较多,篇幅有限,无法面面俱到,作者在删繁就简的过程中不得不舍弃更多素材,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点到为止的浮光掠影。

但这足够了,它就像一本民国大师的索引,将读者引入一个黄金时代,至于那里蕴藏的丰富宝藏,则任凭读者自由挖掘了。书后详列的参考书目,就是一座索引引导读者进入时代深处的桥梁。

一曲自由的赞歌

是什么造就了这一大师辈出的黄金时代?读罢全文,自由就像是一条隐藏的暗线贯穿全书始终。造就这一学术“黄金时代”的重要因素在于:独立自由。

自由的源头,在于有一群勇于担当善于旋舞的学人们。他们不仅在学术上造诣颇深,且善于进行社会活动,敢于为学人们争取自由研究的经费和环境,充当政治和学术的缓冲地带。丁文江、吴宓、傅斯年等大师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他们为学术理想四处奔走,尊重知识,筹措资金,广罗人才,不惜从海外聘请学者,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学术合作。正是他们的积极推动,为学人们营造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一个可以心无旁骛潜心做学问的环境。

学术环境由此在这样的自由开放环境中慢慢滋生,生长成乌托邦的模样。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们可以读到由陈寅恪和王国维审订的中外书籍;借书不限量,只要写出书名,过两个小时就会有图书馆的人员把书送上。师生关系也是开放的,亦师亦友,共同砥砺前行。这样的环境培养出的学生,日后也渐渐成为新一代的大师。

书中多次引用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和自由,不仅是贯穿了一代学人们的治学理念,也是他们毕生追求的学术理想和恪守的学术尊严。为了学术的独立,陈寅恪忍病也要前往重庆为胡适投出一票;为了学术的自由,傅斯年公开与前来抓捕学生的军警抗衡。正是这样昂扬的气节,对学术矢志不渝的追求,才让那个时代在一段内忧外患的历史中闪烁着人性的光芒。

一声现实的呼号

黄金时代已经远去了,但他们留下的故事和延续的精神却从未书尽。

地质研究所一代人的心血装成的两个木箱,再也没有了下落,“北京人”头骨短暂现世后又失去了踪迹。陈寅恪的人生后二十年,双目几近失明,却仍奋力著书,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重要著作。曾参与安阳殷墟发掘的高去寻,人生的最后三十余年在埋首整理老师梁思永的遗稿,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侯家庄》发掘报告,并在扉页书:“梁思永遗稿,高去寻辑补。”

这些故事的书写,令读者潸然泪下的同时,也是作者的奋力疾呼: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劈出一线光明。

这些学人们不畏艰难,一心只为了心中的学术和民族复兴的理想,于是他们开辟鸿蒙,从书斋走向田野,攀山越岭,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生命奠定基石,他们处在一个学术的黄金时代,而也正是他们独立自由的治学理念和学术信仰,造就了这一黄金时代。

不迷信权威,不迎合权力,相信科学,尊重常识,保持开放。这是他们的信仰,是任何时代的学人都需要秉持的信条,也是本书于当世的现实意义所在。

好书



《女兵方队:五次大阅兵背后的故事》
艾蕊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这部报告文学记述了1984年以来五次大阅兵背后,女兵方队从选拔、组建、训练到受阅的艰辛过程,展现了女兵们爱国忠诚、坚韧不拔、拼搏奉献的时代风采。



《从无穷小到无穷大》丛书(全2册)
郑永春 寒木灼萌 著
邓跃 廖朝阳 胡优 绘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丛书从两个维度分别介绍了“小到无穷小”“大到无穷大”,既带领孩子们在微观世界里探索原子、分子以及量子力学的奥秘,又从宏观视角介绍各种天体与可观测宇宙的境界,展现宇宙尺度的浩瀚与壮丽。